

## 读《石遗室诗话》札记<sup>\*</sup>

魏 泉

**摘 要:**陈衍的《石遗室诗话》是晚清诗话集大成之作,也是他建构“同光体”诗论体系的核心诗论。这几则关于《石遗室诗话》的札记,主要辨析了“同光体”的宗宋问题及其所承继的诗学路径;追溯并讨论了陈衍提出的重要诗学主张如“三元说”、“学人之诗说”,其产生背景及诗学脉络;在溯源“同光体”的前身问题上,以陈衍与钱基博、钱仲联的论诗分歧及其离合为中心,分析了晚清诗学背后的学术之争和地域之分,试图在旧体诗学以唐宋诗之争为背景的框架内,理解晚清诗学的发展理路和陈衍诗论建构的重要性。

**关键词:**陈衍;同光体;学人之诗;“三元说”

### 一

“同光体”是晚清民国旧体诗坛最大的诗歌流派。因其上接道咸年间的“宋诗派”,一般认为这一诗派以宗宋为主流。在“唐宋诗之争”的诗史脉络中,清末民初的“同光体”与“南社”,分别代表着界分唐宋的不同诗学路径。作为“同光体”这一名称的首倡者,陈衍以《石遗室诗话》及其续编为中心,辅以《近代诗钞》的编选,为“同光体”建构了一个相当庞大而又相对严密的诗学体系。这一体系的建构,非成于一时一地,而是在陈衍诗文品鉴、师友交游的漫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。

《石遗室诗话》的最早面世,是在1912年由梁启超主办的《庸言》杂志。陈衍“月成一卷,卷可万言”,至1914年夏《庸言》杂志停刊时,共刊行十三卷(不知出于什么原因,其中第十二卷付阙如,故实际所登只有十二卷。所缺之第十二卷,实为商务版中的第十一卷)。虽然《庸言》杂志停刊,而“诗之可话者尚多”,故1915年,应李拔可之请,陈衍又为《东方杂志》继续撰写诗话,至1918年,共出十八卷。1929年,陈衍将两杂志所刊诗话“删改合并,益以近来所得”,成三十二卷,由商务

印书馆出版。三十二卷本中,一至十三卷基本维持原貌,《东方杂志》所刊的十八卷中删掉了卷十一、十三、十四全部,卷十也被删掉两大段,最后的四卷为新作。1933年底,陈衍又撰《石遗室诗话续编》在上海《青鹤》杂志连载,至1934年成诗话六卷,1935年由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出版。

在《石遗室诗话》卷一,陈衍即拈出“同光体”之名:“丙戌在都门,苏堪告余,有嘉兴沈子培者,能为同光体。同光体者,余与苏堪戏目同、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也。”<sup>①</sup>此段实则出自陈衍作于1901年的《沈乙庵诗序》,而所述之事,在癸未丙戌间,即1883—1886年间。因此,从陈衍与郑孝胥论诗提出“同光体”之称,到《石遗室诗话》续编于1935年的出版,前后所历,长达半个世纪。

### 二

人多以“同光体”为宗宋,而最初陈衍与郑孝胥揭帜于此,非常明确地表白,同光体诗人,是指作诗“不专宗”或曰“不墨守”盛唐。若说专宗、墨守盛唐,实为明代“前后七子”所倡诗风。因此,陈衍意中之“同光体”,不是对此前清代诗风的反拨或补偏救弊,而是对道咸诗风的接续与承传,是

<sup>\*</sup>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社会转型中的旧文人研究”(10BZW075)阶段性成果。

<sup>①</sup> 陈衍:《石遗室诗话》卷一,钱仲联:《陈衍诗论合集》,福州:福建人民出版社,1999年版,第6页。

在道咸诗风的基础上,力破余地,并试图在理论上为清诗自立面目。故《石遗室诗话》开篇便道:

道咸以来,何子贞(绍基)、祁春圃(寓藻)、魏默深(源)、曾涤生(国藩)、欧阳礪东(格)、郑子尹(珍)、莫子偲(友芝)诸老,始喜言宋诗。何、郑、莫皆出程春海(恩泽)侍郎门下。湘乡诗文字皆私淑江西。洞庭以南,言声韵之学者,稍改故步。而王壬秋(闳运)则为《骚》、《选》、盛唐如故。都下亦变其宗尚张船山(问陶)、黄仲则(景仁)之风,潘伯寅、李莼客(慈铭)诸公,稍为翦覃谿(方纲)。吾乡林欧斋布政(寿图),亦不复为张亨甫(际亮)而学山谷。嗣后樊榭(厉鹗)、定庵(龚自珍),浙派中又分两途矣。<sup>①</sup>

“始喜言宋诗”就是“不专宗盛唐”,此意从陈衍为沈曾植、郑孝胥所做的诗序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。

陈衍与沈曾植相识于1898年(戊戌)武昌张之洞幕府。在此前十多年,陈衍便从郑孝胥处听说过沈曾植其人,并得读其诗作,叹为“同光体之魁杰”。而沈曾植也曾琉璃厂买过陈衍所编《元诗纪事》。两人论诗相契,时托吟咏,至庚子(1900年)始散。两年间,沈作已逾百首,陈衍“叙而存之”,认为沈诗古体“雅尚险奥。磬牙钩棘中,时复清言见骨,诉真宰,荡精灵”;而近体则“无不文从字顺”。文中记载二人论诗语,乙庵自称“诗学深,诗功浅。夙喜张文昌、玉谿生、山谷内外集,而不轻诋七子”。陈衍则告以“君爱艰深,薄平易,则山谷不如梅宛陵、王广陵”<sup>②</sup>。显然,陈衍眼中的“同光体魁杰”,喜欢中晚唐的张籍、李商隐,而又不轻诋“诗必盛唐”的明七子,于宋诗则喜欢黄庭坚。在陈衍推荐下,又急读梅尧臣和王令,正可为“不专宗盛唐”之注。

在作于1902年的《海藏楼诗叙》中,陈衍更是详述与郑孝胥二十年间的论诗宗旨与变化。谓海藏楼诗“始治大谢,浸淫柳州。乙酉归自金陵,

访余于西门街,则亟称孟东野”。待“己丑庚寅入都”,则“案上手钞诗本,有晚唐韩偓、吴融、唐彦谦诸家。北宋梅圣俞、王荆公诸家。君诗已一变再变,为姚合体、为北宋”。<sup>③</sup>也是不墨守盛唐。

### 三

钱仲联在晚年所编《陈衍诗论合集》的前言中,概论陈衍诗论体系,最为精辟:

先生之论诗,以为道咸以降,丧乱云旌,身丁变风变雅以近于诗亡之会,故其选诗之旨,无异于尼父之删诗,盖有感于诗与时事相关之切而云然,其所见为先立乎其大,此其一。先生又昌言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,于其乡严仪卿诗有别才非关学之说,不予首肯。以为诗也者,有别才而又关学者也。于是又著《诗品平议》,监钟嶸说诗之脑,而直截严家饿隶滥觞之所自,视冯班纠谬,抑又进焉。扶掖救偏之意,不憚言之反复,是真得帝之悬解者矣。此其二。先生又以为诗不废学古而尤贵拓字,然后能取精用宏以至于无穷。于是创为开元、元和、元祐三元之论,谓诗盛于唐,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,力破余地。果墨守旧说,不读唐以后书,惟有日蹙国百里而已。若无新变,何以代雄,先生固籀其旨以诏来学者。此其三。<sup>④</sup>

如上所述,陈衍论诗,首先是有感于诗与时世相关之切,主风雅正变之说;其次以为“诗也者,有别才而又关学者也”<sup>⑤</sup>,倡言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;又以为诗不废学古而尤贵拓字,创为开元、元和、元祐“三元说”昭示来者。

但从其所提出上述主张的时间顺序上说,正好是反过来的。

最早是“同光体”这一发明。《石遗室诗话》中,除提出了“同光体”名称之外,其核心的主张,一为“三元说”,一为“学人之诗”说。至于以“风雅

① 钱仲联:《陈衍诗论合集》,第6页。

② 陈衍:《沈乙庵诗序》,《陈石遗集》,福州:福建人民出版社,2001年版,第506页。

③ 陈衍:《陈石遗集》,第508-509页。

④ 钱仲联:《陈衍诗论合集》,第1-2页。

⑤ 陈衍:《瘦庵诗叙》,《陈石遗集》,第520页。

正变”论诗,见于著述的是在其成书于1920年、出版于1923年的《近代诗钞》中。

“三元说”主要形成于在武汉张之洞幕府与沈曾植、郑孝胥等论诗的时期;<sup>①</sup>“学人之诗”说的成熟则与其居京十年的经历大有关系;而以“风雅正变”论诗,主要形成于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后,亦即后期回家乡主持纂修《福建通志》时期。

“三元说”见于《石遗室诗话》卷一所载陈衍与沈曾植论诗,言之甚详:“余谓诗莫盛于三元,上元开元,中元元和,下元元祐也。”沈曾植认为“三元皆外国探险家觅新世界、殖民政策、开埠头本领”,陈衍认为“今人强分唐诗宋诗,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,力破余地耳。庐陵、宛陵、东坡、临川、山谷、后山、放翁、诚斋、岑、高、李、杜、韩、孟、刘、白之变化也。简斋、止斋、沧浪、四灵,王孟韦柳、贾岛、姚合之变化也。故开元元和者,世所分唐宋人之枢轴也”。<sup>②</sup>

“三元说”主要是指示“同光体”之“不专宗盛唐”的具体诗学路径。在发表于1916年《东方杂志》的《石遗室诗话》卷七(即商务版《石遗室诗话》中的卷二十一)中,陈衍又提到:“道咸以来,程春海、何子贞、曾涤生、郑子尹诸先生之为诗,欲取道元和、北宋,进规开、天,以得其精神结构所在,不屑貌为盛唐以称雄。”<sup>③</sup>在这里,陈衍进一步把道咸诸老与其“三元说”联在了一起。如此一来,在陈衍的诗论里,道咸年间的宗宋诗风就与晚清的“同光体”在“不屑貌为盛唐”和“不墨守盛唐”上堪称同调,且在取道“三元”,力破余地的为诗取向上一脉相承。这在陈衍诗论中是一个颇有意味的推进。

读书至此,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“同光体”的“宗宋”,提供了某种契机。

首先,道咸年间的诗风最突出的特点是“以才学为诗,以文为诗,以议论为诗”,这种与“唐

音”相对举的“宋调”,并非有宋一代所独专,而实开自唐代最优秀的诗人杜甫,后经韩愈“以文为诗”,泛滥其轨,至宋代苏黄,遂成为一代大观。故而道咸年间的宗宋诗风,以杜韩苏黄为取法的楷模,而其所学于杜韩苏黄之处,不在于规规摹拟其字句,也不单借鉴其“以才学为诗,以文为诗,以议论为诗”的途径,而是尤为看重其觅新世界的探险家精神和力破余地的本事。道咸年间诗风主变,学古是为创新,复古旨在通变,故于宗宋也只是借为入手;到其出手时,标举“不俗”,强调“有我”,而又贵有“诗之真者”。张维屏的“水当入海千条合,诗可呈天一字真。便到古贤须有我,独开生面肯依人”<sup>④</sup>,正可代表当时诗人的共同追求。

其次,道咸诗风之所以可以“宗宋”一言以蔽之,还涉及到诗体正变的问题。严羽《沧浪诗话》说:“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,遂以文字为诗,以才学为诗,以议论为诗。夫岂不工,终非古人之诗也。”<sup>⑤</sup>以诗体正变而言,昔人多以唐诗为正,以宋诗为变。至清尚有“见诗之能变而新者,则举之而归之学宋”。<sup>⑥</sup>

陈衍以“同光体”上接道咸年间宗宋诗风,别具慧眼以程恩泽、祁寯藻、曾国藩为道咸年间“以高位主持诗教者”,进而拈出其“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”的诗学主张。

#### 四

如果说,清诗能够度越元明而与唐、宋并峙,其不同于唐音、宋调的最突出的特点,就是“学人之诗”。特别是处乾嘉汉学之后的道咸年间,这一诗坛风尚特色更为突出。

一般来说,学者“以学为诗”,不外两途:一是用诗来谈学问,作考据,此即钟嵘《诗品序》所称

① 陈衍居张之洞幕府九年(1897-1906),其相与论诗者皆一时胜流,“同光体”之名即由此圈中生发。

② 陈衍:《石遗室诗话》卷一,钱仲联:《陈衍诗论合集》,第9页。

③ 钱仲联:《陈衍诗论合集》,第291页。按此句出于陈衍所作《密堂诗钞序》一文,该文作于乙卯(1915)冬日,陈衍将之摘录于《石遗室诗话》中,可见为其此一时论诗的主张。

④ 张维屏:《覃溪先生有诗见怀次韵奉报》,《张南山全集》(三),广州: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,1994年版,第60页。

⑤ 严羽著,郭绍虞校释:《沧浪诗话校释》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61年版,第26页。

⑥ 叶燮:《黄叶村庄诗序》,《已畦集》卷八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第244册,济南:齐鲁书社1997年版,第84页。

“虽谢天才,且表学问”<sup>①</sup>;二是以学问涵养性情识力,写景言情,俱富学养,有厚味,正如杜甫所自道“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”。

为陈衍推尊为道咸年间“学人之诗”代表人物的程恩泽,在其《金石题咏汇编序》中有这样一段话:

或曰:诗以道性情,至咏物则性情绌,咏物至金石,则性情尤绌,虽不作可也。解之曰:诗骚之源,首性情,次学问。《诗》无学问则《雅》、《颂》缺,《骚》无学问则《大招》废。世有俊才洒洒,倾倒一时,一遇鸿章巨制,则瞠然无所措。无它,学问浅也,学问浅则性情焉得厚。<sup>②</sup>

他认为“诗以道性情”,而题咏金石之诗亦能道性情,此性情之“庄雅”或“激昂”,“自学问中出也”。程恩泽的“诗骚之源:首性情,次学问。《诗》无学问则《雅》、《颂》缺、《骚》无学问则《大招》废”,虽非惊人之语,细忖则比严羽“诗有别才,非关书也,诗有别趣,非关理也。然非多读书,多穷理,则不能极其至”<sup>③</sup>这句名言更进一层。首先,严羽《沧浪诗话》“以盛唐为法,说江西诗病”,是以“诗之盛时”为标准立论;而程恩泽讲“诗骚之源”,考察的是“诗之初时”;其次,严羽只说“非多读书,多穷理,则不能极其至”。但“至”是什么样子,却语焉不详,让后人争论不休。程恩泽讲“《诗》无学问则《雅》、《颂》缺,《骚》无学问则《大招》废”,明确道出学问对诗的重要性在哪里,直可为严羽之言作注,而又并不以学问代替性情或先于性情,虽出语平实,但无可争议,实出于汉学家本色。

以考据学问入诗,是道咸年间的“宋诗派”的显著特点之一。作为学者,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寝馈经史,钩玄抉微,学问淹通,考证赅洽,故“溢而为诗”,也不脱学人本色,每个人都写过几首考据诗,或在诗中杂以考据。像程恩泽的《柷赋》并序、

《橡茧歌》,祁寯藻的《郴石砚歌并序》、《水轮歌并序》、《苗先路读段氏说文解字注,知徐楚金系传姑苏,黄氏、顾氏各有影钞北宋足本,假观之原形诸咏叹,可谓勤已,次答以志同好》,郑珍的《玉蜀黍歌》、《安贵荣铁钟行》、《腊月廿二日遣子俞季弟之綦江吹角坝取汉卢丰碑石,歌以送之》,莫友芝的《芦酒三首》、《甘薯歌》等。以考据入诗,可以说是以才学为诗、以学问为诗的极限,其价值在于尝试最大限度地拓展诗的表现领域。这种学问诗、考据诗并非诗之正格,也不是上述诗人创作的主要成就,不妨说是他们身为“宋诗派”的注册商标而已。

此外,以考据入诗,也是受到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。《晚晴簃诗汇序》论清诗第二事即说:“肴核坟典,粉泽苍凡,证经补史,诗道弥尊。”钱锺书先生认为此说“囿于汉学家见地。必考证尊于词章,而后能使词章体尊”。<sup>④</sup>同样的情形其实也发生在宋明理学最盛之时,朱熹的《斋居感兴二十首》,被李东阳《怀麓堂诗话》认为“以经史事理,播之吟咏,岂可以后世诗家者流例论哉”。故此钱锺书说:“宋学主义理者,以讲章语录为诗,汉学主考订者,以注疏簿录为诗,鲁卫之政尔。”<sup>⑤</sup>然而,“诗可以观”,清代考据诗的盛行也正是清代学术文化在诗中的反映和体现。

第二种意义上的“学人之诗”,则是黄庭坚所称杜甫诗“无一字无来历”的嗣响。姚鼐说:“道咸间,经儒通人作为韵语,刊落风华一归真实,大率以杜韩苏黄为归,盘屈奥衍,而语必由衷,文无虚设。”<sup>⑥</sup>这里的“经儒通人”,指的正是陈衍所追溯的“宋诗派”。钱锺书谓:“清人号能学昌黎者,前则钱蔥石,后则程春海、郑子尹……程郑皆经儒博识,然按两家遗集,挽硬盘空,鼈口去鲸掣……妙能赤手白战,不借五七字为注疏考据尾闾之泄也”。<sup>⑦</sup>可见,“宋诗派”诗人的真正长处,并不

① 参阅钱锺书论“学人之诗”,《谈艺录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84年版,第177页。

② 程恩泽:《程侍郎遗集》卷七,道光二十五年(1845)刻本。

③ 严羽著,郭绍虞校释:《沧浪诗话》第26页。

④ 钱锺书论“学人之诗”,《谈艺录》,第177页。

⑤ 钱锺书:《谈艺录》,第177页。

⑥ 姚鼐:《桐风萝月馆随笔》第二条,《姚鼐集剩墨》,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1994年版,第72页。

⑦ 钱锺书:《谈艺录》,第177页。

在其能以考据入诗,而在于能以学问驭其才华,厚其性情,助其诗艺。因此,在师法前人、力破余地之时,所表现出来的雄深博雅、奇崛奥衍的诗美风格。这种美学风格不是对宋诗的模仿,而是清诗的创新。陈衍拈出“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”,正是道出了清诗这一大特色。

## 五

清诗这一特色的形成,是在唐宋诗之争的背景下,伴随着对严羽“诗有别材,非关学也”<sup>①</sup>说法的论辩展开的。自清初以迄清末,各家对此曾各抒己见,见诸笔端者不胜枚举。如朱彝尊诗有“诗篇虽小技,其源本经史。必也万卷储,始足供驱使。别才非关学,严叟不晓事”。<sup>②</sup>而沈德潜则替严羽辩解:“严仪卿有‘诗有别才,非关学也’之说,谓神明妙悟不专学问,非教人废学也。”<sup>③</sup>这两种意见,在后来的诗话中被屡屡提及,而问题的关键,不在诗是否有“别材”,而在诗之别材,是否“关学”。

乾嘉之际,学人辈出,其后学者论诗多倾向于杜甫所云“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”,而以严羽之说为非。如朱珔序胡承珙诗集云:“严沧浪之说,务在‘不著一字,尽得风流’。其弊卑者沦滑调,高者堕禅机。剿袭雷同,毫无变化。惟杜陵自道生平曰‘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’。推原厥旨,必先事阅览,书味积胸,然后涵邈而吐滂。但恐填滞,运思匪灵,所以贵能破也。而竟谓诗具别才,不关学问,岂笃论哉。”<sup>④</sup>

这种注重学问的诗学观,至道咸年间乃演为诗坛主流。程恩泽论诗主张“首性情,次学问”,“学问浅则性情焉得厚”?<sup>⑤</sup>郑珍也称:“固宜多读

书,尤贵养其气。气正斯有我,学赡乃相济。”<sup>⑥</sup>真实性情和深厚学问,是“学人之诗”赖以在诗的天空翱翔的两翼。陈衍对“学人之诗”的认识,也是沿着这条线索而来。

在开始撰写发表《石遗室诗话》的同一年,陈衍为罗拔东诗集作序,曾有感而发,“深辩仪卿之言”:

严仪卿有言,“诗有别才,非关学也。”余甚疑之。以为六艺既设,风、雅、颂之体代作,赋、比、兴之用兼陈,朝章国故,治乱贤不肖,以至山川风土草木鸟兽虫鱼,无弗知也,无弗能言也。素未尝学问,猥曰“吾有别才也”,能之乎?汉魏以降,有风而无雅,比兴多而赋少。所赋者眼前景物,夫人而能知而能言者也,不过言之有工拙。所谓“有别才”者,吐属稳,兴味足耳。若三百篇,则朝章国故、治乱贤不肖之类,足以备《尚书》、《逸周书》、《周官》、《仪礼》、《国语》、公、谷、《左氏传》、《戴记》所未有,有之必相吻合。有其不合,则四家之师说异同,齐鲁韩之书缺有间者也。未尝学问,猥曰:“吾有别才也”。能为之乎?……故余曰,诗也者,有别才而又关学者也。少陵、昌黎,其庶几乎!然今之为诗者,与之述仪卿之言则首肯,反是则有难色;人情乐于易,安于简,“别才”之名又隳绝乎丑夷也。<sup>⑦</sup>

在这里,陈衍与程恩泽“《诗》无学问则《雅》、《颂》缺,《骚》无学问则《大招》废”的说法一脉相承。

此年,陈衍在《与梁众异黄秋岳书》中,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,其称诗文创作“非为之久,佐以读书、见事、积理之多,则恒不工,工亦不至”。<sup>⑧</sup>与“工与不工”,“至与不至”的概念相近,陈衍还有

① 郭绍虞谓沧浪最初所言为“诗有别材,非关书也”,后为人改为“非关学也”,遂启后世种种争议。此一段公案,参阅《沧浪诗话校释》,第33页。

② 朱彝尊:《斋中读书十二首》,《曝书亭集》卷二十一,《四库全书本》第1317册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,第630页。

③ 沈德潜:《说诗碎语》卷下,《清诗话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63年版,第550页。

④ 朱珔:《求是堂诗集序》,《小万卷斋文稿》,道光二十六年(1846)刻本。

⑤ 程恩泽:《金石题咏汇编序》,《程侍郎遗集》卷七,道光二十五年(1845)刻本。

⑥ 郑珍:《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》,《巢经巢诗集笺注》,成都:巴蜀书社,1996年版,第595页。

⑦ 陈衍:《癸庵诗叙》,《石遗室文集》卷九,《陈石遗集》,第520页。

⑧ 陈衍:《石遗室文集》卷八,《陈石遗集》,第501页。

“能”与“称”的说法。<sup>①</sup>所谓“工”、“至”、“能”、“称”，在陈衍看来是比宗唐还是宗宋更根本的问题。次年(1913)，陈衍为同乡剑怀堂主已舟先生作《剑怀堂诗草叙》，于此分说甚明：

今之人，喜分唐诗宋诗。以为浙派为宋诗，闽派为唐诗，咎同光以来，闽人舍唐诗不为而为宋诗。夫学问之事，惟在至与不至耳。至则有变化之能事耳焉，不至则声音笑貌之为尔耳。<sup>②</sup>

这些概念所表达的核心理念，不外乎其所谓“诗也者，有别才而又关学者也”。这一方面是对严羽之说和后世论诗分唐界宋的超越；另一方面也是对“近来英俊，雅不喜多读书”的不满。<sup>③</sup>此间(1912-1914)陈衍论诗，从辩严羽之非入手，承道咸诸公余绪，突破争唐界宋的樊篱，认为“诗人、学人二者，非肆力兼致，不足以薄风骚，副雅材”。<sup>④</sup>

到《近代诗钞》出版的1923年，陈衍对严羽之说又有了新的辨析和体悟，并发之于《李审言诗叙》中：

余屡言，诗之为道，易为而难工。工也者，必有异乎众人之为，则读书不读书之辨也。诗莫盛于唐，唐之诗，莫盛于杜子美。子美曰：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。”子美之言信，则严沧浪“诗有别才非关学”之言误矣。然非沧浪之误也……故沧浪又曰：“非多读书多穷理，则不能及其至。”故别才不关学者，言其始事；多读书云云，言其终事，沧浪固未误也。<sup>⑤</sup>

但又说“孔子教人学诗，终以多识。大小雅皆

称雅材，其非空疏无物也，可断言矣”。<sup>⑥</sup>此种说法，较之前人更为融通透彻，而其根底经史的论诗思路又于其中一以贯之。

1927年，陈衍序黄濬《聆风簪诗》时，对此有清晰的表述：

余生平论诗，以为必具学人之根柢，诗人之性情，而后才力与怀抱相发越。三百篇之大小雅材是已。今人为诗，徒取给于汉魏六朝唐宋诸名家，虽号称巨子，立派别，收招才俊，免于风而不雅之诮者盖寡。<sup>⑦</sup>

但是在经历了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1920年代，不但小说要取诗文的正宗地位而代之，诗坛也为大胆抛开传统格律、别求新声的白话新诗大量占据。这在笃于旧体诗的陈衍那辈人眼中，等于是“去小雅废而诗亡也不远矣”。<sup>⑧</sup>所以在当时，并能认同陈衍此说者堪称寥寥，陈衍自谓“审言、映庵、无识数人而已”。<sup>⑨</sup>难怪陈衍要以“不足为不知者道”来结束其文了。

## 六

在追溯道咸年间的“宋诗派”为“同光体”的前身的问题上，钱基博与钱仲联持论有所不同，与陈衍诗论构成某种张力。

钱基博在其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中对道咸年间的宗宋诗风的描述与陈衍大致相同，谓“道光而后，何绍基、祁寯藻、魏源、曾国藩之徒出，益盛倡宋诗”。<sup>⑩</sup>但与陈衍自程恩泽、祁寯藻上溯至嘉道间的钱载不同，钱基博是从曾国藩上溯至桐城

① 陈衍为王树枏作《文莫室诗续集叙》云：“人之言曰：明之人皆为唐诗，清之人皆为宋诗。然诗之于唐宋，果异与否，殆未易以断言也。……余于诗文无所偏好，以为惟其能与称耳。”此文作于1914年4月。《陈石遗集》，第578页。

② 陈衍：《石遗室文集》卷九，《陈石遗集》，第522页。

③ 陈衍作于1914年9月的《与胡瘦唐书》云：“近来英俊，雅不喜多读书。所为词章，率矜妙悟，否亦捋扯涂抹，苛细凌杂，味厥本源。”《陈石遗集》，第576页。

④ 陈衍：《榕荫谈屑叙》，作于1914年，《陈石遗集》，第580页。

⑤ 陈衍：《陈石遗集》，第681页。

⑥ 同上。

⑦ 同上，第688页。

⑧ 陈衍：《近代诗钞叙》，《陈石遗集》，第641页。

⑨ 陈衍：《聆风簪诗叙》，《陈石遗集》，第688页。

⑩ 钱基博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，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·钱基博卷》，石家庄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6年版，第40页。

姚鼐,认为曾国藩“诗自昌黎、山谷入杜,实衍桐城姚鼐一脉”。<sup>①</sup>钱基博以为姚鼐诗“以清刚出古淡,以道宕为雄”,而其教人“学诗须先读昌黎,然后上溯杜公,下采东坡,于此三家,得门径寻入”,此“由韩学杜,已开晚清同光体之先河”。<sup>②</sup>认为晚清“同光体”的诗学门径是由桐城古文家姚鼐开出的。

在为陈衍八十大寿所作寿序中,钱基博对陈衍之诗有一番持平公允之论,称:“丈诗最有名,盖有会于宋贤梅宛陵之苍秀,陈后山之奥峭,杨诚斋之拗折,陆放翁之宏肆,而以上窥韩昌黎之雄奇肆诡,熔裁而出之一手。精思健笔,时有拙语,而气能运之,成章以达……透辟生峭,与陈散原、郑海藏一时争雄,同出宋贤西江,而蹊径各别。散原奥峭,而出之以磊砢;海藏枯涩,而抒之以清适。丈则奥衍而发之以爽朗,凿幽出显,力破余地,此其所独也。”<sup>③</sup>钱仲联称“此段论石丈诗至当”<sup>④</sup>。

但钱基博文中又借赞陈衍之文“不规规于桐城”之机,对桐城诗派作了更进一步的梳理:“桐城自海峰以诗学开宗,错综震荡,其原出李太白。惜抱承之,参以黄涪翁之生崛,开阖动荡,尚风力而杜妍靡,遂开曾湘乡以来诗派,而所谓同光体者之自出也。”并且谓陈衍《近代诗钞》之选,欲“开户牖,设坛坫”,而因“嗣响无人,遂貽论同光体者以数典忘祖之讥”,<sup>⑤</sup>表面上夸陈衍的文章,暗里却是驳陈衍的诗论,所以被人说“不无弦外

之音”。<sup>⑥</sup>在作于次年的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的“四版增订识语”中,钱基博又再次将此意拈出,谓“诗之同光体,实自桐城古文家之姚鼐嬗衍而来”,并称此意“自来未经人道”。<sup>⑦</sup>可见钱基博对自己这一说法的重视非同一般,简直视为自己的独得之秘。

钱基博长于论文,论诗的名气和造诣本不如陈衍,但在认定桐城诗派为同光体的前身这一点上,却择善固执,而且这一论点在邃于清诗的钱仲联那里得到了响应。

钱仲联 1934 年受聘到无锡国专教书,时钱基博与陈衍都在该校任教。受陈衍影响,钱仲联于 1935 年开始撰写其《梦苕盦诗话》。对于清诗,钱仲联自谓与陈衍崇尚不同,“对近代诗人最佩服的是黄遵宪、丘逢甲、金天翮三家”,<sup>⑧</sup>故于陈衍《近代诗钞》,钱仲联曾颇有微词,条举其“未能满意”之处。<sup>⑨</sup>但对《石遗室诗话》及其续编,仍称其“衡量古今,不失锱铢,风行海内,后生奉为圭臬。自有诗话以来所未有也”。<sup>⑩</sup>《梦苕盦诗话》中提到陈衍八十寿诞的盛况时,特于钱基博寿文中录其有关桐城诗派的见解,并谓:“此一段议论,余亦主张。前曾于诗话中发之,惟尚不及此之详。”<sup>⑪</sup>

二钱与陈衍的论诗分歧,主要是因为各自的出发点不同,或者说有汉宋之争的影子。陈衍标举的是“以学问为诗”的“学人之诗”,所关注的是道咸年间京师汉学家圈子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如祁寯藻、何绍基,以及同出程恩泽门下,以朴学著

① 钱基博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,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·钱基博卷》,石家庄:河北教育出版社,1996年版,第40页。

② 同上。

③ 钱基博:《陈石遗先生八十寿序》,《陈石遗集》,第2167页。

④ 钱仲联:《梦苕盦诗话》,济南:齐鲁书社,1986年版,第155页。

⑤ 钱基博:《陈石遗先生八十寿序》,《陈石遗集》第2168-2169页。

⑥ 钱仲联:《梦苕盦诗话》,第155页。

⑦ 钱基博: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,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·钱基博卷》第562页。

⑧ 见《钱仲联学述》,杭州: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,第31页。

⑨ 钱仲联《梦苕盦诗话》云:“石遗交游遍海内,晚清人物,是集已得大半。然名家如丘逢甲等皆未入选。而选录诸家,如魏源、姚燮、朱琦、鲁一同、王锡振、邓辅纶、高心夔、黄遵宪、袁昶、沈汝谨、范当世、刘光第、康有为、金天羽,皆未尽所长。即郑珍、陈三立、沈瑜庆、陈曾寿诸家,名篇尚多,皆从刊弃。至于樊增祥之彩云曲,王国维之颐和园词,皆誉满艺林,无愧诗史者,岂得以长庆体之故,遂屏不录。”第22页。

⑩ 钱仲联:《梦苕盦诗话》,第140页。

⑪ 见钱仲联《梦苕盦诗话》,第155页。所谓“前曾于诗话中发之”是指《梦苕盦诗话》所云:“自姚姬传喜为山谷诗,而曾求阙祖其说,遂开清末西江一派。”第85页。

称于时的郑珍、莫友芝等人;而钱基博强调的是在道咸年间以理学名臣著称的曾国藩“诗嗜黄庭坚”所产生的影响力。曾国藩为文私淑姚鼐,登高一呼,使桐城古文有以中兴,所以,钱基博之溯源“以文为诗”的桐城诗学,也有其充分的理由。应该说,溯源“同光体”的前身,当道咸年间,宋诗派与桐城诗派二者之间,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唯用“以学为诗”和“以文为诗”可以大略勾勒二派之异。

除了学术之争外,地域之分也影响到学者论诗。钱仲联的《梦苕盦诗话》以“清代诗风,浙派为盛”<sup>①</sup>作为论诗角度,在浙派中着力推举“同光体”中的沈曾植,认为“其学术自群经诸史道藏佛典边徼地理诗词杂艺,无一不造精微。以性不好名,不自表暴,世但知其为书家为诗人而已。然即以诗论,亦属第一流,晚清名家,无能驾其上者”。不同于陈衍之称沈曾植“能为同光体”,钱仲联以之与袁昶并称为“晚清浙中二杰”,谓二家“皆能以汉、魏、晋宋为根柢,而化以北宋之面目者”。<sup>②</sup>至于时人为诗多宗散原而对沈曾植之诗“不能好之”,钱仲联的解释是“以其包涵深广,不易搜穷故”。<sup>③</sup>又说:

迩来风气多趋于散原、海藏二派,二家自有卓绝千古处。散原之诗巉险,其失也琐碎;海藏之诗精洁,其失也窘束。学者肖其短以相夸尚,此诗道之所以日下。惟乙庵先生诗,博大沉郁,八代唐宋,熔入一炉,为继其乡钱穉石以后一大家,可以药近人浅薄之病。然胸无真学问者,不敢学,亦不能学。否则举鼎绝膑,其弊不至于艰深文浅陋不止也。<sup>④</sup>

对于陈衍在《石遗室诗话》中对他“诗多隽句,雅似其乡何梅生,又甚似海藏”的评价,钱仲联也并不以为荣,辩解道:“此则丈但见余已刻之二仲诗,

故为此言。”他说自己的诗“后此所作,风格大变”,认为金松岑所评其诗“初冷隽而终博丽”才算得上“知己之言”。钱仲联之所以不愿意人说自己的诗似福建诗人何振岱和郑孝胥,而强调自己此后诗风的大变,他自己的一句“殊不愿在闽人门下讨生活也”<sup>⑤</sup>颇能道出其心态,同时,也是对他以浙派论诗的最佳注脚。如果说,钱基博的溯源姚鼐,是要在“宋诗派”之外,以“桐城诗派”来另树一帜的话,那么钱仲联之推尊沈曾植,则是欲以“浙派”而与当时遍及诗坛的“闽派”分庭抗礼。

这种强烈的地域意识,跟陈衍在《近代诗钞》中录闽人诗作过多、比重太大有关。汪辟疆曾专门对陈衍《近代诗钞》所录道咸以后的371位诗人的籍贯做过统计:“以籍贯计之,八旗八人,直隶六人,山东一人,山西三人,奉天一人,河南四人,安徽二十七人,四川十六人,湖南三十七人,湖北十七人,江西二十人,江苏五十四人,浙江四十三人,福建九十四人,广东二十七人,广西四人,贵州四人。云南、陕西、甘肃、吉林、黑龙江,则无一入选。”其中福建诗人人数占了四分之一,所选诗篇也“几占全书三分之一以上”,汪辟疆对此非常不满,指责陈衍这种做法“真乡曲之私也”。<sup>⑥</sup>

其实,陈衍录闽籍诗人过多,固然不能没有标榜乡贤之意,但另一方面也应考虑陈衍选《近代诗钞》,是在已经编过的《师友诗录》基础上扩充,依据自己的“数十年见闻所及,录其尤雅者”,<sup>⑦</sup>而光宣年间闽籍诗人又的确为活跃于诗坛的一大流派。所以,尽管钱仲联、汪辟疆等人的指责不无道理,但与其说这是陈衍的“乡曲之私”,不如说“囿于闻见”更合乎情理。

【责任编辑 王宏林】

作者简介:魏泉,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。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旧体诗文、报刊、文人集团。

① 钱仲联:《梦苕盦诗话》第83页。

② 钱仲联:《梦苕盦诗话》第106页。

③ 钱仲联:《梦苕盦诗话》,第61页。

④ 钱仲联:《梦苕盦诗话》,第65页。

⑤ 钱仲联:《梦苕盦诗话》,第156页。

⑥ 汪辟疆:《评陈石遗〈近代诗钞〉》,《汪辟疆文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8年版,第820页。

⑦ 见陈衍《近代诗钞叙》之编者说明文字,《陈石遗集》,第640页。